



政略與戰略

STRATEGY

● 作者/Niall Ferguson ● 譯者/田力品 ● 審者/劉宗翰

# 季辛吉的時代價值

## The Meaning of Kissinger: A Realist Reconsidered

取材/2015年9-10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2015)



圖為1971年，時任國家安全顧問的季辛吉側立空軍一號的座艙門。(Source: AP/達志)

**季辛吉理念可解讀為一種對現實政治創新的批判，  
這些觀念至少對外交政策提供四項卓見：歷史是了解敵友的關鍵；  
必須面對問題與猜測間的不對稱代價；許多外交決策是權衡諸惡後的選擇；  
領導者應該要擔心道德真空之現實主義危害。**

除了他的長壽以外，還有許多理由使得世界上眾多領袖，包括中共主席習近平，不斷地向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請益，而他卸下美國國務卿的職務已近40年了。從這點看來，歐巴馬的表現實屬罕見。從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總統以來，他是第一位沒有向季辛吉請益的美國總統。評論家每隔一陣子就要敦促他更「季辛吉化」(Kissingerian)一點。其他人則認為他實際上已經季辛吉化了，只是用字遣詞不同罷了。但這個名詞究竟代表的是什麼呢？

傳統答案把季辛吉等同於現實主義，其理念特徵是透過外交政策的冷靜評估以強調國家自身利益，或者，如同知名記者路易斯(Anthony Lewis)所述，現實主義是「以人性為代價下對秩序與權力的一種迷戀。」季辛吉的前哈佛同僚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在1983年把季辛吉描述成一個馬基維利主義者(Machiavellian)，他寫道「他相信國家的生存需要冷酷與欺騙，並以犧牲國內外之敵對勢力為代價。」許多作家曾經認為季辛吉以他心目中的英雄，奧地利政治家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與古典歐洲現實政治的倡導者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為效法對象。

然而國際關係學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一位真正的現實主義者，曾經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季辛吉，就像奧德修斯(Odysseus)一樣是「多面向」的。例如在1960年代早期，當時出現一項令人困擾的問題，美國應該盡多大努力支持南越政府？季辛吉最初相信南越自決的權利值得美國人的犧牲。但是摩根索，這位真正的現實主義者，卻激烈地反對。

在1950年和1960年代，季辛吉實際上的確寫過有關梅特涅和俾斯麥的文章。但只有那些沒有讀過(或那些有意誤解)其所述的人，才會熱衷地宣稱季辛吉在1970年代開始，在外交政策上複製梅特涅和俾斯麥的論述。季辛吉並未採取馬基維利的路線，他在職涯一開始的時候，由理想主義者的三個面向來看，就是個理想主義者。

第一，即使季辛吉從未像理想主義者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這般，藉由國際法和集體安全追求世界和平，但季辛吉也絕不是個現實主義者。季辛吉並未採取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因為他認為，理想主義的高尚情操很可能造成政策癱瘓。就如同他在1956年告訴其歷史學家友人格勞巴德(Stephen Graubard)，光是這種堅持經常導致不作為這個理由，「堅持純粹道德的本身，就是最不道德的態度。」但季辛吉了解現實主義也有可能呈現政治癱瘓。季辛吉本身就是來自納粹德國





的難民，並在1944年二戰末期投效美軍對抗納粹德國，由於1930年代的外交失敗，季辛吉付出了個人代價。然而不僅只於此，如同他在1975年的一次訪問中提到，英國姑息主義的建構者，鮑德溫(Stanley Baldwin)與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都曾經認為他們自己是立場堅定的現實主義者。」

第二，在哈佛大學就讀期間，季辛吉曾經沉浸在康德(Immanuel Kant)學說之中，其哲學觀曾經是個理想主義者。他未出版、名為〈歷史的意義〉(The Meaning of History)的大學畢業論文，是一本推崇康德歷史哲學的評論。季辛吉的核心論點是「自由是生命決定何者具有意義過程中的一種內在經驗。」就如同康德所主張的「永久的和平」，可能在實際上是歷史最終且無可避免的目標，但由個人角度看來，前述的不可避免性，並非是對自由的一項限制。季辛吉在他的論文中寫道，「無論一個人對於事件必然性的概念為何，在事件發生的當下，它們的不可避免性並不能對如何因應提供方向……。」然而吾人可以在事後解釋行為，

行為之所以發生，乃是奠基於發自內心對抉擇的深信。」

第三，從他職涯的早期，季辛吉就是一個堅定的反唯物主義者，他對資本主義形式的經濟決定論的敵意，就如同對於馬列主義的敵意一般。他在論文中認為，放任「民主的爭論變成討論經濟體系的效率，還說這是基於客觀的必要性，因此是可辯論的，」這真是個危險的說法。相反地，「自由的內化機制……將會回絕極權主義，即使極權在經濟上更有效率。」這種態度與他同時代的人對比鮮明，例如經濟學家及政治理論家羅斯托(Walt Rostow)認為，只要資本主義者成長人數高於共產主義者，就會贏得冷戰。季辛吉在《選擇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Choice)乙書中寫道，「除非自由世界能夠使新興國家了解自由概念與對人類尊嚴的尊重，否則在自由民主與共產主義之間誇大吹噓經濟競爭……將不具任何意義。」換句話說，自由民主的理想是為了自身利益必須受到保衛，而非基於資本主義在物質上的成就。這是季辛吉在1960年代身兼洛克斐勒(Nelson Rockefeller)顧問及

文膽時反覆主張的論調。雖然洛克斐勒三次提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都未能成功，但季辛吉都給予支持。

如同季辛吉在其第一卷的回憶錄中所觀察到，「高階職務可以歷練決策，而非實質內容……整體而言，位居高階職務期間只會耗損智識能力，並不會創造智識能力。」既然幾乎所有學術目光都集中在季辛吉擔任公職期間，他的智識能力——他於1950年代早期到1960年代晚期，在哈佛、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與擔任洛克斐勒文膽期間所發展的觀點——並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季辛吉的理念正確地被解讀為一種對現實政治創新的批判，這些觀念至少對外交政策提供四項卓見，而這是歐巴馬，更別說是其後的繼任者，都應該要詳細研究的：歷史是了解敵友的關鍵；必須面對問題與猜測間的不對稱代價；許多外交決策是權衡諸害後的選擇；領導者應該要擔心道德真空之現實主義危害。

## 歷史是各國的記憶

在理想主義哲學之後，季辛吉

在哈佛學到最重要的就是由歷史核心去了解國家安全的問題。

「對於歷史的前因後果沒有認知，是不可能在研究外交事務上——研究國家整體行為——獲致重要結論，」他在1957年出版的博士論文《世界復原》(A World Restored)中寫道：「各國記憶是對渠等政策是否為真的測驗。愈近期的經驗，對於該國基於過去經驗對現況的解讀，愈有深刻的影響。」論文最後，季辛吉問道：

「誰會打算去爭論一個民族對於自己過去的認知？這是該民族面對未來的唯一手段，而『實際上』真的發生了什麼，經常不會比認為曾經發生過什麼來得重要。」對政治學家而言，國家可以「像是安全規劃中的因素。」對律師而言，國家看起來像永無止盡的國際訴訟案件中互為原告及被告的當事人。事實上，季辛吉寫道，所有國家「視自己為歷史力量的表現。均衡並非它們關心的結果，均衡是一種實現歷史渴望的手段。」

季辛吉早年作品反覆出現的主題，是典型美國決策者對歷史的無知。他在1968年評論道，律師是「政府裡最重要的單一群

體，但他們確實有這項缺點——對歷史認識不足。」對季辛吉而言，歷史是加倍重要的：係闡明比喻與定義國家自我了解因素的泉源。美國人或許會懷疑歷史的重要性，但是，如同季辛吉所寫的，「歐洲人因為生活在古代遺跡所覆蓋的大陸，這些遺跡證實了人類的先見之明難免犯錯，因此他們在骨子裡就會覺得歷史要比系統分析複雜得多。」

### 未知中的未知

與大部分的學者不同，季辛吉在他職涯的早期便查覺，高風險的決定經常必須在所有事實都呈現之前就做出判斷。「政策的選擇並非基於『事實』本身，而是基於對事實的詮釋，」他在《世界復原》中如此主張。

「它所涉及的基本上是一項道德行動：係一項基於目標概念的有效性，同時也是對可獲得資料了解的評估。」

這就是季辛吉後來用以建構「外交政策中推測問題」的概念。他在1963年的一次演講中主張，決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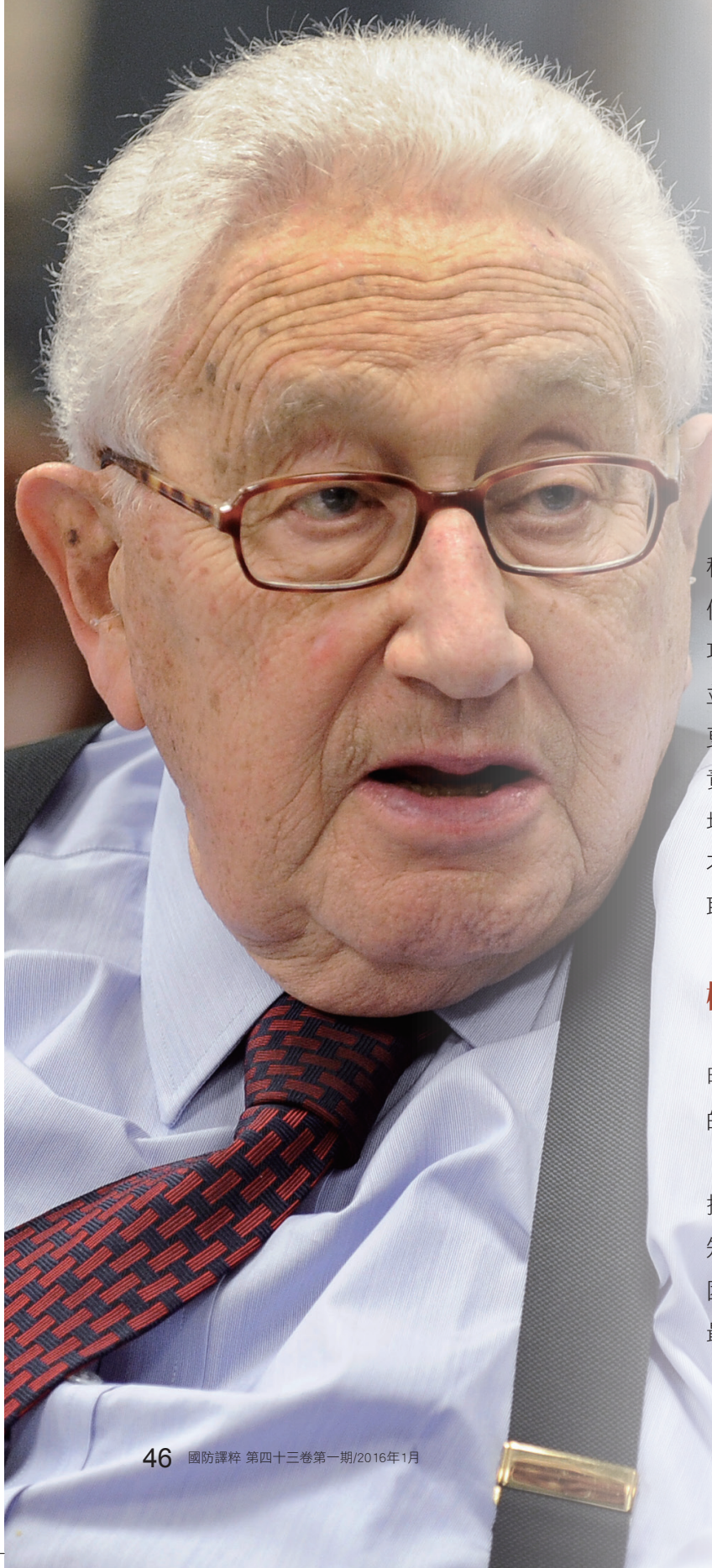
需要具備對未知事情規劃的

能力。當個人置身於新環境的範圍時，面臨的是兩難狀況，因為除了他既有的信念以外，實在少有任何事項可以導引決策者……每個政治家必須在某些時間點，在是否期待確定性或倚靠他自己對情況的評估之間做出選擇……如果他想要顯而易見的證據來證實，那麼在某種意義上，他就受到事件的羈絆了。

如果民主國家在1936年就反對納粹，季辛吉認為，「今天我們就不會知道希特勒是否被誤解為民族主義者，是否他的目標有限，或者是否實際上他就是個瘋子。民主國家後來知道他實際上真的是個瘋子。他們確定了，但卻必須為此付出幾百萬條人命的代價。」

這項卓見在核子時代具有深遠的影響，核子時代的世界大戰可能造成數億人傷亡。另外，在1963年另一篇未出版名為〈核子世界的決策〉(Decision Making in a Nuclear World)的論文，季辛吉總結了他所稱「恐怖兩難」(terrible dilemma)，這是冷戰時期決策者所面對的：





每一個政治領袖都在最不費力的評估和需要更費力的評估之間做出選擇。如果他決定採取最不費力的評估，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結果或許證明他是錯的，而他將必須付出沉痛的代價。如果他基於猜測而行動，他將無法能夠證明其作為是必要的，但他可以避免自己後來受到嚴重的傷害……如果他及早行動，他不會知道是否有必要性。而如果他等待，也許他夠幸運，或者他不夠幸運。

關於猜測所衍生的問題，重點在於成效的不對稱。一項成功的先發制人行動，並不會獲得等比例的益處，如同季辛吉寫道，「成功的政策具有一項本質，那就是後來的人會遺忘非常有可能原來並不是像現在這樣的事情。」先發制人的政治家更容易因為先發制人所需要的明顯代價而遭到譴責，但是卻不會因為避開災難而受到讚揚。相反地，拖延時間——1930年代姑息政策的核心——也不一定導致災難。而最不費力的事，通常就是採取最不會被國內抗議的路線。

### 權衡諸害取其輕

「事情不是只有對或錯，其中還有許多暗晦不明之處，」年輕的季辛吉在1948年一封給他父母的信中寫道，而這封信的內容發人深省。他認為，「生命中真正的悲劇並非在對或錯中所做的選擇，」因為「只有最麻木不仁的人才會選擇他們已知是錯的選項……真正的兩難是靈魂所面對的困難，這也是痛苦的來源。」簡單來說，外交政策最困難的選擇必定是要在諸害之中做出選擇，因



此真正的道德行動是取其輕(即使在政治上這是個更困難的選擇)。

例如1957年季辛吉在《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乙書中主張,維持冷戰期間的權力均衡,將需要這樣的困難選擇:

美國確信將會面對極端混沌不明的情勢,例如內戰或政變……毫無疑問地,美國應該尋求預先阻止此一情勢的發生。但是一旦發生了,美國必須尋找行動的意志,並且只能在從諸害中做出選擇的情境中冒險。雖然美國將不會放棄原則,但必須了解,除非美國存活下來,否則無法堅持自身的原則。

這本書在哲學上的基礎就是一個明顯令人憎惡的事情,例如一場有限度的核戰,如果替代選項是屈從讓步或澈底殲滅,核戰也可以算是輕害。在這本書的最後一章,季辛吉清楚地提出一項輕害的通論可以當作某種信條:

如果美國可以把行動限制在一個自身道德、法律與軍事立場

的完全和諧,同時生存所需項目亦大致具有合法性,那將是令人欣慰的。但是身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將不再擁有單純的道德選擇,而這項選擇是美國為更安全過去所堅持的……要處理如此模糊的問題,首先要預設一項道德行動:冒險的意願是基於不完全的認知,並且是為了自己原則不完美的實踐。對於絕對的堅持……就是把不行動當成對策。

後來,在1966年,季辛吉對於越南提出了類似的主張:「美國並沒有特權決定只處理那些迎合美國道德成見的挑戰。」但是在那之前,他已經了解對北越的戰爭只能經由談判結束。他已親眼看到,美國「對於遂行軍事行動來對抗游擊隊與建立一個國家皆缺少整體的概念。」美國陳舊的龐大資源與複雜的官僚體系並不適合對北越作戰。與倉促地放棄南越,或者進一步升高美國對北越的軍事對抗比較起來,和平談判是一個輕害。

### 對現實主義的幻覺

在他所寫關於梅特涅和俾斯

麥的著作——在他對俾斯麥的未完成專著手稿中表現的最為明確——季辛吉清楚地表示,他認為純粹外交政策上的現實主義是潛在的道德敗壞。他在對俾斯麥未完成專書中的某一章寫道,「社會缺乏犬儒主義的勇氣。對人的堅持如同原子,對社會的堅持如同暴力一般,經常引導到相反的力道過程而侵蝕所有的自制。因為社會的運作憑藉的是約略的概等,同時因為社會不具有仔細區別的能力,一項把權力當作手段的學說最終將因權力中止而告終。」

的確,俾斯麥有許多策略是季辛吉極為欣賞的。經由研究俾斯麥,他發現使敵手相互競爭的重要性。根據季辛吉的論點,德國統一之後,俾斯麥的新歐洲秩序,是植基於他「操弄其他國家承諾的能力,而使得普魯士較任何其他競爭方之間更為接近。」特別是季辛吉盛讚俾斯麥在1887年再保險條約(*Re-insurance Treaty*)所展現的精緻模糊,在這一項秘密協議中,如果德國與俄國其中一國介入第三國戰爭,另一國將遵守中立,除非德國攻擊法國或是俄國攻



擊德國的盟國奧匈帝國，這項協議卻被俾斯麥的繼任者拋棄，導致歐洲外交致命的僵化。然而，在他的論文〈白色革命〉(The White Revolution)中，季辛吉基本上抱持達爾文的觀點，認為國際關係就是一場以生存為目的之不道德爭奪，因此認為俾斯麥註定無法將地緣政治的成果制度化。

季辛吉認為民主時代之核心問題在於人民喜愛魅力型領袖，更勝於精明的政治家。季辛吉在《世界復原》中寫道，「先知所聲稱的是完美的忠告……(但)烏托邦除非經過平定及混亂的過程，且必然侵蝕所有模式的義務，否則將無法達成……(雖然)完全依賴個體道德純潔性，就是放棄約束的可能性。」與先知相反，季辛吉站在政治家的一邊，因為政治家「永遠對這些作為抱持懷疑態度，這並不是因為他享受操控的卑鄙，而是因為他必須為最壞的不測預做準備。」政治家的某部分悲劇，是他必須永遠是少數，因為「世人受到啟發並非因為平衡，而是因為普遍性；並非因為安全感，而是因為不道德感。」

## 那場70年代大秀

季辛吉擔任公職的經驗在許多方面也非常貼切地描述了這最後一點。雖然在剛開始的時候，被媒體大肆宣傳為「超級K」(Super K)，但他後來卻成為左派和右派尖銳批評攻擊的對象，左派譴責他在第三世界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右派則譴責他對克林姆林宮的卑躬屈膝。或許因此鮮有證據顯示，季辛吉對外交政策的卓見曾被制度化甚或被人記得。

季辛吉在1968年出版的一篇論文中如此寫道，「世界上不存在像美國外交的這種東西。」世界上只有「一連串帶來一定結果的舉措」，而這些結果「並非是計畫中的產物」，而「國內外的研究或情報組織，試圖要為這些結果賦予合理性及連貫性……但這些根本都是不存在的。」同樣的情形在40多年後的今天也依然存在。季辛吉對於缺乏戰略一貫性的解釋來自於現代民主的病徵。不同於十九世紀的領袖，他解釋道，「現代社會管理的典型政治領袖具有堅強的意志、強大能力，這些足以使他當選，但對於他就職之後將要做的，卻沒有很大的想法。」再一次地，同樣

的情況也適用於今日。

歐巴馬及其顧問們對歷史並不擅長。在2012年總統大選時，最令人難忘的俏皮話之一，是歐巴馬嘲笑他的共和黨對手羅姆尼(Mitt Romney)說：「那些活在80年代的人如今正在要求回復他們的外交政策，因為冷戰結束已經20個年頭了。」他那時是在嘲弄羅姆尼把俄國當成是「我們地緣政治頭號敵人」的說法。然而，不到17個月後，俄國違反國際法，兼併了克里米亞。歐巴馬在2014年1月曾經誇說，他現在真的完全不需要肯南(George Kennan)，很快地也成了空談。

然而，也許不是80年代而是70年代在要求。那個年代就像現在一樣，美國經濟也面臨嚴重的打擊，留下了持久的影響。1973年的石油短缺就如同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像尼克森(Richard Nixon)一樣，歐巴馬承繼了一場從軍事角度而言並沒有輸的戰爭，但在國內卻深深地不受歡迎。伊拉克戰爭是這個世代的越戰，除了歐巴馬承繼一場正在打贏的戰爭之外，其餘要歸功於像波特雷斯(David Petraeus)與麥克里斯托(Stanley McChrystal)等指

揮官所主導的增兵。

就像尼克森一樣，歐巴馬也面臨一個對友好關係有時裝得很感興趣，但實際卻又興趣缺缺的俄國：人們很容易忘記蘇聯頭子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在他當權的年代是像普丁(Putin)般的人物，不止企圖支配蘇聯的後院，同時也企圖控制全世界。另外，和尼克森一樣，歐巴馬發現他的歐洲和亞洲同盟非常難以駕馭。今日的西歐各國所花費的國防預算占國家歲入支出的比例，比起1970年代要少得很多。他們已經忘記了季辛吉那句著名的老話，「當和平——被認為用以迴避戰爭——已經成為一國或多國的主要目標，國際系統就落入最冷血的那個國際社會成員的手中。」同時，由於亞洲國家認為歐巴馬所謂的側重亞洲(pivot to Asia)是個騙局，於是正與美國背道而馳，發展自己對付中共的軍事戰略。而中東情勢則與季辛吉時代相同，至少到今日為止仍是大火藥庫。

不論如何評論尼克森和福特政府時期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可否認的是季辛吉在他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職務之初，至少展

開一項戰略架構，藉以因應美國所面臨的挑戰，而此一戰略的每一項考量因素，都是建構於本文前述所揭的四項原則之上。

季辛吉在1960年代中期開始建構的戰略具有三項特別要素。第一，他力求復興與西歐的泛大西洋聯盟。為了反制強大而自省的西歐勢力整合與西德的東方外交(*Ostpolitik*)，他試著振興美國與其他三個歐洲主要強權國家的雙邊關係：法國、德國與英國。第二，他力求除了在戰略武器管制之外，尋找美國及蘇聯之間合作的機會，以擴大緩和政策(*détente*)的內涵，同時又不放棄抵抗蘇聯擴張與遏制蘇聯力量擴張之基本原則。最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他開始察覺到雖然中共具有明顯的革命性質，但中共有可能會捲入權力平衡之中，而美國可以利用中(共)俄間的對立，拉近雙方相互競逐的距離，而非加大雙方間的對立。對於季辛吉的評論，長久以來都著重於探討他執行這項戰略時戰術上的錯誤，特別是在對於他所認定的次要國家。但這些評論沒有辦法否認這也是一種戰略概念。今日，世人所看到

的是將近七年沒有執行這項概念的苦果。

美國的決策者(不僅僅是現任政府中的)長期以來太過於輕忽歷史對了解自身國家的重要性。在一次又一次的決策之後，他們已經無法掌握猜測問題的重要性，有時候甚至低估了先發制人的利益，甚至更低估了不作為所要付出的代價。他們在不相稱的眾害之間迴避困難抉擇，並在故弄玄虛說詞的面紗背後，執行不論在國內外都永遠欠缺合法性的犬儒式現實主義。由於這些原因，美國發現自己幾乎處於一個如同在1968年底的戰略混亂之中。美國迫切需要一項季辛吉式的解套策略。但首先決策者——以及社會大眾——必須要了解季辛吉所代表的意涵。

#### 作者簡介

Niall Ferguson係哈佛大學勞倫斯·提希(Laurence A. Tisch)歷史系教授，同時也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資深研究員，著有《季辛吉，1923-1968：理想主義者》(*Kissinger, 1923-1968: The Idealist*)乙書。

Copyright © 2015,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